

THE BUREAU
My Thirty Years
in 调查局
—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
Hoover's
BI

威廉·沙利文口述 比尔·布朗整理

调 查 局

——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

〔美〕威廉·沙利文 口述
比 尔·布 朗 整理
王 丽 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THE BUREAU
My Thirty Years in Hoover's FBI
by

William C. Sullivan
with Bill Brown

根据美国诺顿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译出

调 查 局
——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

[美] 威廉·沙利文 口述
比尔·布朗 整理
王 丽 平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15,000字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3203·027 定价：0.85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介绍和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著作和报道已为数不少，但有关主要在美国国内活动的情报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情况的著作则不多见。《调查局——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一书可以为我国读者了解这个机构的内幕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本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内情报机构的运转情况及其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情况；对控制这个机构长达四十余年的局长胡佛的独断专行、权欲熏心、刚愎自用、文过饰非，对这个机构怎样充当约翰逊总统等人得心应手的工具，怎样同肯尼迪弟兄作对，怎样同尼克松相互利用，怎样同中央情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互相拆台，怎样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进行策反，怎样处理近几十年一些有影响的重大间谍案件，怎样迫害群众运动领袖人物，以及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重重矛盾、倾轧……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总之，本书可以使我国读者对联邦调查局几十年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美国官僚体系的各种内部关系也可窥见一斑。

本书作者威廉·沙利文自四十年代自愿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当上普通特工人员后，历任该局各种级别的重要职务，直到上升为该局第三把手，后因与胡佛有歧见而被排挤出该局。因而他对该局有从下到上的全面了解，对一些内幕的揭露应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沙利文将本书的材料准备齐全之后，于一次外出打猎时不幸身亡，最后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比尔·布朗协助完成本书。但是，用布朗的话说，“这是沙利文的著作，每一个字都是他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

引 言

我第一次见到比尔·沙利文*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在为一部有关越共的电视纪录片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工作。我觉得，这一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反战积极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国家有联系。约翰逊政府告诉我们，这些示威活动之所以这么气势汹汹，主要是受到美国国内和美国以外的共产党人指使的缘故。我想知道，反战派是否受过北越人、也许是俄国人的训练，或者从他们那里得到经费。我给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打了电话，安排了一次同他们的犯罪档案处人员的会面。众所周知，这个处是一个负责同报界联络的部门。

虽然联邦调查局里没有人认得我，但他们安排我会见的却是一位高级官员。此人叫威廉·沙利文，是情报处助理处长。当时，我满以为会听到关于有多少反战分子受到共产党指使、甚至接受共产党提供的经费这样一番官样文章式的介绍。

沙利文是个矮小精干的人，谈吐清晰，条理分明。他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是一位詹姆斯·卡格尼式的人物，兼

* 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有一点新英格兰气质。他的介绍使我大为惊异。我没料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会对一个陌生人讲这样的话。沙利文说：“反战人士中只有极少数人同共产党国家有联系。至于美国共产党，那根本用不着重视。他们不再是一支重要力量了。反对这场战争的年轻人大都不过是一些具有爱国心、但却一心要使美国摆脱在越南的战争的青年。”

在其后的几年中，比尔·沙利文和我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沙利文都称赞从事实际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责骂胡佛只注重自己的声望，缺乏判断力。

在胡佛于一九七一年把沙利文赶出调查局之后，沙利文虽然感到忿懑，但却决心要为改组这个他为之服务达三十年之久的部门出一把力。我确信，他决不想当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所希望的是今后永远不再由一个把持偌大政治权力的胡佛式的人物来领导这个部门。

在沙利文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几年之后，他开始对我谈起，他想写一本有关他在联邦调查局内的经历的书。他说，这本书要讲真话，要使公众有机会了解调查局的内幕。他要求我帮忙。

在其后的两年中，我同沙利文见过几十次面，有时是在新罕布什尔他的家中，有时是在距他在马萨诸塞州博尔顿的出生地不远的地方。他记忆非凡，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这些交谈的一个突出之点是：每当他引述胡佛的讲话时，他总是用一种冷漠的、令人不愉快的大嗓门讲话，而他引述胡佛讲话的时候是很多的。

到了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已经把比尔要讲的关于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材料全部整理出来了。不料，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我看到了一家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在新罕布什尔他的住所附近的森林中打猎时因发生意外而身亡。此后，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也发了一条电讯，对于他是否真因发生意外而死提出怀疑，并暗示，鉴于他所了解的情况，他可能是被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害死的。我赶到比尔的家中，参加了他的葬礼，同地方当局以及他的家属都谈了话。我同他们一样确信，他的不幸身亡的确是出于发生意外造成的。

下面就是比尔·沙利文的书——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是从同他的谈话和他的文稿中摘录下来的。这是沙利文自己在讲述他在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中供职三十年的经历。

比尔·布朗

一九七九年三月于纽约市

目 录

引言.....	1
一 结束与开端.....	1
二 罗斯福、杜鲁门和艾克.....	29
三 “该死的肯尼迪弟兄”.....	42
四 林登·约翰逊的工具.....	55
五 为联邦调查局作宣传.....	80
六 马戏团里的生活.....	109
七 局里的畸零人.....	125
八 公民的权利与对权利的侵犯.....	134
九 小马丁·路德·金.....	149
十 新左派.....	162
十一 间谍活动.....	183
十二 尼克松年代.....	224
十三 不愿再冒风险.....	232
十四 十七起窃听电话的活动.....	248
十五 约翰·迪安和管子工.....	262
十六 门上了锁.....	274

附件一	休斯顿备忘录.....	292
附件二	沙利文给约翰·迪安的备忘录.....	303
附件三	胡佛和沙利文最后几次通信.....	307

结束与开端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胡佛在大叫大嚷。

“自从我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我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以前也从未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

“要是以前有人这样对你讲过话，”我回答说，“那现在就用不着我来这样对你讲了。我本来早就应当对你讲讲这些事的。”

胡佛望着我那份放在他桌子上的备忘录，说道：“为了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可真没少祈祷啊。”

这个骗人的老手！居然求助于祈祷了。这在他可是头一回。几天之后，当我回想起我们的那次会面时，我才想到，当时我应当对他说：“胡佛先生，让我们两个人此刻就在这里跪下来，一起祈祷吧。”

可是，实际上，我对他说的却是：他是靠着威吓手段统治调查局的；这些年来，在他的淫威下，联邦调查局中那些忠心效力的人一直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我还说，我不想再受

他的恫吓了。总之，我把自从我成为一名新特工人员以来一直想对他说的话全都对他说了。

待我说完，只见他面红耳赤，气急败坏，结结巴巴地连话也说不利落了。最后他嚷了起来：“十分清楚，你是不信任我的领导！”

“是的”，我回答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你不再信任我的调查局了！”

我再次同意了他的说法。“不错。我认为，你要是退休，那就是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个嘛，我还没有这种打算，”他一边仍旧望着我的信，一边反唇相讥。“格林参议员直到九十岁还留在参议院呢。”

胡佛没有说下去，想使气氛缓和一下。最后，他抬起头，我们的眼光第一次相遇了。

“我已经同米切尔司法部长研究过了。他同意我的意见，那就是：应当被赶走的是你。我同尼克松总统也讨论过这件事，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转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我便无法进我的办公室了。锁已经换过，我的名字已经从门上去掉了。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三十年之后，我终于离开了它。

兹任命你为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CAFO级，年薪三千二百美元。

信的落款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签名。我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收到，并以矛盾的心情读完这封信的。事实上，当我的两位在我之前到联邦调查局去工作的朋友建议我报名时，我的申请书在办公桌里放了两个星期，因为我要权衡一下利弊。

虽然日本轰炸珍珠港是半年之后的事，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年中的那个时候，就已看得很清楚：美国参加欧洲那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我渴望参军，我已经向陆军情报处提出了申请，要求到国外去服役。

当时，我在波士顿的国内收入署工作。当我决定参加联邦调查局的考试时，我的上司曾对我说，他不会批准我调换工作地点。我去找了国内收入署在波士顿的最高负责人。他同意放我，但这只是因为我要到联邦调查局去。他肯定地对我说，要是我想到任何别的政府部门去工作，他是决不会答应的。接着，他便讲起了关于勇敢的特工人员与危险的罪犯的故事，讲起了我即将开始的令人振奋而又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其后的一些年头，从四十年代初期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在我到过的美国所有地方，我遇到的许许多多从事各种职业的男人和妇女，对联邦调查局也都有这样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从一开始，我就对联邦调查局的公众联络工作发生了兴趣，到我担任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领导职务时，我便认识到，埃德加·胡佛在公共关系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

一旦我通过了初步考试并获准离开国内收入署（我没有得到陆军情报处的回音），还要克服的唯一障碍就在我自己这

方面了：我是否真想到联邦调查局中工作？我对执法一窍不通。我甚至没有多少学干这一行的兴趣。

我唯一的志向是到新英格兰一所小的学院去当教师。我在到国内收入署工作之前曾在我的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博尔顿当过一名英语教员。我的根基在博尔顿。那是一个只有四百来人的小镇。我就是在那里，在我父母耕耘了五十年的土地上长大的。我想定居在博尔顿或者一个很象博尔顿的小镇。当初，我之所以到波士顿去工作，只是由于它给了我一边工作一边进修，最终取得学位的机会。但是，我知道，要是我去当特工人员，那我就只好抛弃我的教学生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是不能再兼其它职业的。

我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去找了当初鼓励我报名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两位特工人员中的一位。我连珠炮似地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最后还把我拟好的一份问题单交给了他。要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看到那份提出各种怀疑和批评的长达好几页的单子，他们是决不会雇用我的。但是，我的朋友没把我提出的问题告诉任何人。就这样，虽然我仍对调查局怀着一种矛盾心理，他的回答还是说服了我，使我决定争取到调查局去工作。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有五十个人去司法部报到，接受做特工人员的训练，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工作。我感到，我们五十个人当时正在跨进一个未知天地的大门。

一开始是每次参加新工作照例会有 的 细 琐 程 序：填表格，在文件上签字，参观办公地点。在参观过程中，我看到

一些年轻妇女在阅读报纸并从报上剪下一些材料来。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停下来向她们中的一位询问她们在干什么。

“把批评局长的文章剪下来，”她回答说。接着她还告诉我，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分局都从事剪报工作。把剪下的文章寄给在华盛顿的胡佛。

当我比较仔细地观察与我一起受训的人时，我开始发现，我们五十个人有一些共同点。虽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经历也不相同，但是我们班上没有犹太人，没有黑人，也没有拉美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胡佛的政策。

我的那位当特工人员的朋友曾告诫我，我们班上大概有一两个人是为局里的上司们当坐探的。而且他教给我如何鉴别他们。联邦调查局中的上层人物挑选来当坐探的都是一些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就到联邦调查局中工作的人，年纪都在十八、九岁，正是可塑性很强的时期。这些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许多人还要开夜车，要弄个法学或者会计学的学位），对联邦调查局也都是极其忠诚的。现在在得到大学学位或法学学位后到调查局工作的人中虽然还可能找到这种忠贞不二的人，但这种人毕竟不那么常见了。许多年之后，我听说苏联情报机构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它真正信任的只是那些在莫斯科列宁学院那样的苏联学校中受过训练的美国共产党人。

象我这样的“外面进来的人”则是迥然不同的。我们比一般学员年龄要大一些。我们中有许多人在当特工人员之前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们比较有主见，能

自主，不大容易被那些权欲熏心的家伙唬住。一开始，我们当中甚至有人对调查局的政策提出怀疑，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了，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肯定会使我们早早地退休。

受训者不断受到压力，迫使他循规蹈矩。内部的坐探是一个时时存在的威胁，使人不敢畅所欲言。关于某些特工人员的可怕故事不脛而走。那些特工人员违反了联邦调查局的规定，便“因印象不佳而被解雇”，而且永远无法在政府中再找到工作了。然而，尽管周围是一片恐怖和疑虑，学员们的热情却仍然很高。

我们是生气勃勃的一群，能干、勤奋、准备接受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所要接受的考验。我们当过律师、教授、政府雇员、商人、职业运动员、执法官员、工程师、保险评定员、记者、教员。一位教官说：“这个训练班学员的总的质量说明，联邦调查局在招收人员方面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我们又怎么能不同意这种看法呢？

我们的教官曾一再对我们说，几百人中只有一个能经得起严格的审查和考验，最后被任命为特工人员。我们是“尖子”、“精华”。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是高于联邦政府所有其他雇员的，正如调查局本身显然比联邦政府所有其它机构高出一头一样。四十年代后期，胡佛曾要调查局为通用食品公司的一位经理、前调查局特工人员托马斯·麦克达德为某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提供材料。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世界上最精心挑选的人》。

胡佛认为联邦调查局只能在别的部门之上，不能在别的

部门之下。他觉得调查局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种思想一直渗透到我们的教官的头脑之中。一位教官对我们学员作过这样的解释：联邦调查局的座右铭——“我们决不了结一个案件”胜过加拿大骑警队的座右铭——“我们总能把要追捕的人捉拿归案”。人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前者胜过后者，因为决不了结一个案件的意思是永远不能解决这个案件。但是，谁也不愿向我们的态度严肃、工作辛苦的教官们提出异议。

我们受训的时间是三个月。每周在华盛顿的司法部和附近的匡蒂科(弗吉尼亚州)海军陆战队基地上五天课。每天的上课时间是早九点到晚九点，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还要加课。

我的一位名叫杰佩思·罗杰斯的教官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他的外貌和举止正象我原先预想的那样——聪明能干、目光敏锐、知识渊博。他讲起课来从容不迫，和蔼耐心，随时愿意停下来回答问题。

然而，调查局要找到熟悉保卫国家这个新领域(对调查局来说是新领域)的教官却不容易。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间谍活动与追捕抢劫银行犯和绑架分子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多年来一直从事刑事案件侦破工作的特工人员现在需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掌握新的、复杂的调查方法。对此，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因此，联邦调查局那些当初曾夜以继日地做着从事这一新工作的艰苦准备的教官们应当大受褒奖。他们中有两位是特别突出的：一位是爱德华·摩根(现在是华盛顿的一位出色的律师)，另一位是